

农民运动的伟大纲领

——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农民运动的伟大纲领》编写组

人 民 出 版 社

2785/23

农民运动的伟大纲领

——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农民运动的伟大纲领》编写组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5印张 70,000字
1978年4月第1版 197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1·1642 定价0.23元

编写者说明

本书是由武汉大学历史系、湖南师范学院政史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湖南醴陵县文化馆等单位的同志共同编写的，最后由湖南师范学院政史系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同志参加全书的修改定稿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和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以及两省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本书是我们学习毛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的粗浅体会，由于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一九七八年一月

目 录

- 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光辉产物…………… 1
- 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伟大纲领……………19
 - “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19
 -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30
 - “革命先锋”……………41
 - “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随着农民权力的升涨而动摇”……………51
 - “好得很”……………65
- 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78
- 四、《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光辉思想永放光芒……………90

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光辉产物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当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入高潮，但革命潜伏着严重的危机。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同帝国主义列强和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以陈独秀为头子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复杂。这个斗争，当时集中表现在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正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光辉产物。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那“百年魔怪舞翩跹”的社会里，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互相勾结，象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人民生活极其痛苦。帝国主义列强为了达到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目的，不但在政治上操纵中国的反动政府，而且在

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各自支持其所扶植的军阀势力；而各派军阀则依靠各自的帝国主义作为后台，在中国各省和各个地区实行着反革命的封建割据：由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盘踞在湖南及沿京汉铁路的湖北、河南、河北南部等地；由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东北各省与津浦铁路北段以及京津一带；由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从直系军阀中分化来自成一派的军阀孙传芳，占据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五省。此外，还有桂系军阀、滇系军阀、粤系军阀、晋系军阀等等。各派军阀对外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对内残酷压迫中国人民，彼此之间进行连绵不断的争夺地盘的混战，给人民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灾难。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就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给全国人民指明了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并立即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积极开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首先是集中力量从事了工人运动，从一九二二年一月到一九二三年二月，掀起了全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是，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罢工失败的教训表明，无产阶级不同其他各革命阶级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和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是不可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个强大敌人的。从此以后，党采取了积极的步骤，去联合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组织革命统一战线和革命军队，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进行革命战争。为了正式决定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方针，一九二三年六月，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的立场：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已同意接受中

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主张，并且允许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广东一些地区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将国民党改造成为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国民党原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联盟，我党可以和必须利用、改造国民党成为四个阶级的联盟，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以此吸引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民主革命的斗争行列中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决议：决定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改组国民党成为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革命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的决定，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革命阶级和阶层，而日益发挥其中国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

一九二四年一月，在我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和李大钊、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大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由共产党人起草的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使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同我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相符合。宣言就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大会还通过了在保持共产党独立性的原则下，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的决定；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及改组国民党的各种具体办法。大会选举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毛主席和李大钊、林伯渠等共产党人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的委员或候补委员。这次大会，标志着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大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又帮助国民党健全了中央组织部，设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并在这些中央部门里担负了领导工作。同时，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大都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我党恢复和发展工农运动和建立革命武装创造了有利条件，促进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统一战线建立后，我党即以广州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大力开展工作。一方面，在我党的倡议、领导和支持下，一九二四年五月，在广州东南的黄埔建立了黄埔军校，积极为准备讨伐盘踞在中国大部分土地上的北洋军阀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另一方面，我党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农群众革命运动。一九二四年七月广州沙面罢工，就是全国工人运动由低潮走向高潮的起点。彭湃同志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这时也积极开展起来。

为了迎接全国革命高潮，一九二五年一月，我们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着重讨论了对开始高涨的革命运动如何加强领导的问题。大会除强调中国革命必须有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和领导之外，还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主要成份，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尽可能地鼓动并组织广大农民积极参加经济和政治的斗争。大会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的提出，为群众革命斗争的新高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党的“四大”以后，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这个运动发

端于上海，迅速席卷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的新高潮。“五卅”运动成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革命风暴的序幕。在这个革命高潮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这年六月广州和香港工人的大罢工，即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有力地支持了广东革命政府。

在工农运动高涨的大好形势下，为了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以便进一步推进革命，准备北伐，在我党的倡议和参加领导下，一九二五年二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东征，打垮了尚盘踞在广东的粤系军阀陈炯明部队的主力。六月，东征军回师广州，粉碎了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叛乱。七月，在我党的倡议下，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并将所辖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在军队中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由共产党员担任。十月，国民革命军又举行了第二次东征，最后消灭了陈炯明的军队。同年冬，国民革命军还举行了南征，击溃了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另一粤系军阀邓本殷。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为北伐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将革命推向全国，在我党领导和推动下，一九二六年七月一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九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当时，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分三路进军：西路取湖南、湖北，这是主攻方向；中路取江西；东路取福建。在湖南、湖北战场上，国民革命军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为先锋，他们勇猛机智，果敢顽强，进展神速，七月十二日，攻占湖

南长沙。八月二十二日，占领岳阳。八月下旬，攻占湖北的汀泗桥和贺胜桥。九月，攻占汉阳、汉口，十月，又攻占武昌，取得了湖南、湖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在江西战场上，国民革命军九月攻占江西西南部和西部，十一月初占领南昌和九江。在福建战场上，国民革命军十二月十八日占领福州。随着北伐的胜利，一九二七年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之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分三路进军：西路由两湖北攻河南；东路由福建攻取浙江，于二月十七日，攻占杭州；中路由江西向安徽、江苏进军，于三月先后占领安庆、芜湖、南京。与北伐进军的同时，一九二六年九月，在我党的帮助下，原驻绥远一带的冯玉祥的国民军，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参加革命，于年底占领了陕西全省，并和国民革命军共同进攻河南。从一九二六年七月到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内，国民革命军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部队，占领了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大部地区，把革命从珠江流域一直推进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

在我党直接领导下的广大工农群众，热情拥护和大力支持了北伐战争。当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单是省港罢工工人就组织了三千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冒暑随军出征。国民革命军进入湖南后，长沙、醴陵、湘潭、衡山、衡阳和湘南各县纷纷成立了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广大农民组织了宣传队、慰劳队、破坏队、交通队、向导队、暗探队和武装队等等，与国民革命军并肩战斗。两湖粤汉铁路工人组织铁道破坏队，破坏粤汉铁路，瘫痪了敌军的运输干线，汉阳兵工厂的

全体工人，举行了总同盟罢工，断绝了敌军的军火来源。

工农群众运动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迅速发展；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又推动了工农群众运动的进一步高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的工人运动很快地发展起来。这时工人运动的特点，是普遍组织了武装纠察队，许多地方由罢工斗争发展到武装起义，直接配合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一月，汉口、九江的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夺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同年三月，在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下，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与此同时，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河南、广东、福建、浙江、陕西、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民运动都有迅速的发展。特别是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大革命，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二）毛主席领导和关怀下的湖南农村大革命

湖南农民运动在北伐战争前就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全省农会会员已达四十万人，受党直接影响的群众已达一百多万。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农村中党的力量日益壮大，全省六千多名共产党员中，农民党员就有一千七百五十九人；省农运特派员二百零三人中，共产党员就有一百八十二人。农会组织也有了飞跃的发展，全省农会会员骤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差不多占了全省农民总数的一半，在全省七十五个县中，有五十多个县成立了农会组织，有六个县建立了农会筹备处。在农会的领导下，农村大革命在全省

范围内迅猛地开展起来。历来被地主豪绅看不起、在社会上没有立足之地的广大贫苦农民，挺起身，抬起头，积极跟地主豪绅阶级展开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文化上的斗争。在政治上，他们用暴力手段，推翻地主武装，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夺取过去地主豪绅阶级所掌握的一切权力，对那些劣迹昭著的地主豪绅，则根据他们的罪恶大小，分别采取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监狱、驱逐、枪毙等手段，使他们的体面和威风扫地以尽；在经济上，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加租加押，宣传减租减押；不准退佃；实行减息。在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同时，农民群众还对各种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农民群众的这种革命攻势，造成了一个把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紧密结合的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农民群众创造了中国几千年未曾有过的业绩和奇勋，使广大农村呈显出一派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景象，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

湖南农民运动所以成为当时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一方面是由于两湖是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国民革命军首先攻占湖南，最先消灭湖南境内的军阀部队，这就为湖南农村大革命的迅速开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湖南的农民运动，一直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开展的。

毛主席早在一九一七年就曾深入湖南的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农村，步行了四百五十多公里，历时一个多月，进行过广泛的农村调查。一九二一年，他又深入洞庭湖滨

的岳阳、华容、南县、安乡、常德、湘阴等县农村进行过调查。一九二二年，毛主席在他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中，曾详细地分析过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土地日益集中的原因，指出农民只有团结起来，从地主手中夺回土地才有出路。一九二三年四月，毛主席派遣水口山工人回到家乡衡山岳北农村从事农民运动。经过几个月的访贫问苦、组织发动，于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个农会——“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岳北农工会领导农民进行平粜、阻禁、惩办土豪劣绅的斗争，取得了震撼四乡的胜利，会员曾经达到四万余人，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的先声。一九二五年春，毛主席从上海回到湖南，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韶山的农民运动。毛主席同韶山贫苦农民促膝谈心，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并创办农民夜校，建立秘密农会。“五卅”运动爆发后，毛主席抓住有利时机，以“打倒列强，洗雪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会为中心，建立公开的“雪耻会”，采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此同时，毛主席亲手创建了韶山党支部。韶山党支部组织领导农民协会胜利地开展了平粜、阻禁、增加雇农工资和减轻租额的斗争，韶山的农民运动，很快成了湖南农民运动的核心。毛主席在领导韶山农民运动中，进一步对农村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作了调查研究，并为我们党领导大规模的农民运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湖南期间，毛主席还曾多次指示中共湖南区委选派优秀干部去我党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一九二五年秋，毛主席到广州后，又给湖南区委写信，建议湖南多选派干部去广州农讲所学习。湖南区委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第一批选派了十二人，

第二批选派了四十四人，分别前往广州农讲所第四期和第五期学习。一九二六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办全国性的广州农讲所时，湖南又选派了三十六人前去学习。这些学员，从毛主席那里接受了阶级教育和革命路线教育，学习了开展农民运动的实际经验，提高了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回到湖南之后，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毛主席在广州时，还亲自给韶山党支部写信，指示要把“雪耻会”变成公开的农民协会组织，并寄去一份农民协会的组织章程。韶山党支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立即决定以韶山“雪耻会”为基础，正式成立“湘潭西二区农民协会”。一九二六年三月，毛主席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全面的深刻的分析基础上，在集中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同时，强调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接近的朋友，是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这篇光辉著作不仅为制定我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是指引中国革命从复杂斗争的迷雾中走向胜利的灯塔，而且也是指导湖南开展农民运动的指路明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毛主席从广州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时候，仍然非常关心湖南的农民运动。在毛主席主持下的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所拟定的《目前农运计划》中，强调全国的农民运动除广东省外，应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为重点，同时在陕西、四川、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七省全面展开。为了便于指导湖南、湖北、江西、四川的农运工作，计划中还提出了在汉口设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办事处；在武昌开办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年冬，毛主席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

武汉，积极筹备设立汉口办事处和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成立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讲所的筹备处时，曾推举毛主席为筹备委员。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湖南省农民协会和省总工会在长沙召开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由于毛主席在湖南工农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大会开幕后即发出了邀请毛主席回长沙参加大会的专电。毛主席回到长沙后，十二月二十日举行了盛大欢迎会，毛主席在欢迎大会上畅谈工农革命的大好形势后，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无论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土豪劣绅或者是发展工商业和教育事业，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二十八日，毛主席又在代表大会闭幕典礼上作了革命联合战线的讲演。毛主席强调指出，反革命方面已经有国际、全国和全省的联合战线，革命方面也应该有同样的联合战线来抵抗他们。同时，他严厉斥责了所谓“惰农运动”以及在“帝国主义没有打倒以前，我们内部不要闹事”之类的反革命宣传。毛主席指出，那种只准地主向农民压榨，不准农民向地主作斗争的人，就是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方面，破坏革命的人。毛主席还提醒大家注意，现时湖南虽然是国民政府所统治，但实际上赵恒惕的余孽、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势力还很大。在毛主席亲自参加和指导下，大会制定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政权和农民自卫武装等四十个决议案，并发表了宣言。大会闭幕后，毛主席和中共湖南区委商议，又留下参加大会的党员代表，办了几天短期训练班。他亲自做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进一步提高了农运骨子的政治水平和策略水平。正是由于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

指导，湖南农民运动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的航道上胜利前进，站在全国农民运动的最前列，成了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为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树立了榜样。

(三)毛主席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

惊天动地的农村大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于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国民党右派等反革命势力，迅速麇集起来，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疯狂反扑，掀起了一股攻击和破坏农民运动的逆流，他们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湖南的农民运动。

逃窜在长沙、武汉的一小撮豪绅地主大肆造谣惑众，挑拨离间，诬蔑贫雇农是“痞子”，是“惰农”，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是“土匪行为”，叫嚣“农民运动不取缔，地方就永远不得安宁”。他们造谣说：“农民协会打梭镖是为了把五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的老人小孩全杀绝”。他们还编造出“某军长、师长家产被充公，父亲被杀”等无稽之谈，以挑起国民革命军军官对农民的仇恨。

隐藏在统一战线内部的国民党右派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反动军官，也与地主豪绅一起，诬蔑、攻击、破坏农民运动。蒋介石、张静江之流恶毒诬蔑农民运动是“流氓地痞运动”，是什么“过火行为”，是“矫枉过正”，叫嚣“农民简直赤化”，农会必须“换人”，“要限制”。他们并以分裂统一战线相恐吓，妄想迫使共产党人出来制止农民斗争。当时窃据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部长职务的刘岳峙，也纠合国民党省市党部中的右派分子，

组织了一个名叫“左社”的反共团体，专干破坏农民运动的勾当。他们向省内外和国民革命军大肆散布湖南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公开反对镇压土豪劣绅。在他们炮制的所谓《农村计划》里，恶毒诬蔑农会干部是“流氓地痞”；胡说要农民与地主“联络感情”，“注全力于农产物之增加，农业改良之进步”；叫嚣要由国民党右派直接管辖各级农民协会，如农协有不服从他们的“纪律”者，则“分别改组处究”，猖狂反对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妄图把农民运动纳入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轨道。

在这些家伙的反革命煽动下，湖南城乡的一切反动势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奸商工贼、反动军官、军阀的残余势力、国民党右派，都纠集在刘岳峙的黑旗下，采取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破坏农民运动。他们组织御用农会；或者派人混入农会，进行反夺权；或者拼凑反动团体，有组织地向农民进攻；或者利用团防，勾结土匪和国民革命军反动军官屠杀农民，直至公开实行反革命武装暴动，捣毁农村革命政权机关。可见，在湖南，阶级敌人对农民的疯狂反扑，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阶级斗争已经白热化了。

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一贯轻视农民运动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在反革命逆流面前，完全被吓破了胆。一九二六年九月，在党的四届三中全会上，他抛出了一个自己起草的决议案，系统地提出了放弃无产阶级对农民运动的领导，束缚和压制农民运动的右倾机会主义纲领。一九二七年初，他和反革命叫嚣相呼应，大肆攻击农民运动“过火了”，“搞糟了”，指责湖南农民运动是“幼稚行动”，妄图用解散